

岑参评传

廖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岑参评传

廖立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责任编辑：降 云
封面设计：古 干

岑参评传
Cen Cen Pingzh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218,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1 $\frac{1}{2}$ 插页2

1990年8月北京第1版 199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620

ISBN 7-02-000992-1/K·2 定价 3.70 元

目 录

一、引言	1
二、隐于嵩阳	6
1、岑参的家世	6
2、早年生活	12
3、田园诗	20
三、出入两郡	32
1、干明王	32
2、长安居	39
3、出游	49
四、初授官	57
1、及第与授官	57
2、交游	65
3、向诗的高峰前进	76
五、安西幕府	81
1、去安西的历史背景	81
2、安西行	86
3、安西诗	96
4、东归长安	104
六、长安闲居	112

1、再隐南山	112
2、同杜甫、高适的交游	117
3、其他交游	130
4、出游	135
七、北庭幕府	140
1、北庭行	140
2、封常清	150
3、七言歌行的高峰	155
4、继承与发展	165
5、其他诗	175
6、行役及东归	183
八、入为右补阙	190
1、安史乱起	190
2、入京唱和	201
九、出为虢州长史	213
1、回望动离骚	213
2、虢州山水	220
3、交游	228
4、战争	237
5、又一次从军	242
6、歌行的衰微	249
十、入为郎官	253
1、再入长安	253
2、政治关系	261
3、交游	268
4、游太白山	277

十一、赴蜀及逝世	281
1、入蜀.....	281
2、途中诗.....	289
3、初入成都.....	296
4、嘉州行.....	302
5、罢官及逝世.....	308
十二、岑参的悲剧	319
1、岑参思想中的矛盾.....	322
2、王道仁政幻想的破灭.....	325
3、功名富贵的落空.....	331
4、避世超尘的难行.....	334
岑参年表	340

一、引言

陆游曾这样评价岑参：“尝以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跋岑嘉州诗集》）陆游为什么把岑参看得这么高？这从他所写的《夜读岑嘉州诗集》这首诗里可以看到一点消息：“群胡自鱼肉，明主方北顾。诵公天山篇，流涕思一遇。”所谓“天山篇”，指的是岑参边塞诗。对南宋偏安局面感到痛心，对唐代雄大的国力抱有特殊的感情，因而对岑参的边塞诗由衷喜爱，这大概就是陆游推崇岑参的原因。

宋人和明人对岑参都比较重视。现存宋、明诗话中有不少讲到岑参的地方，以为盛唐诗人除李、杜之外，就是王、孟、高、岑。宋版岑集到今天还留存了半部，明人刊印岑集则有很多种。对照之下，元人和清人对岑参却很冷落。今日见不到元版岑集。清代除《全唐诗》不能没有岑集外，大名鼎鼎的“四库全书”竟不收岑参的集子。清人注书之风极盛，但岑集却没人注。清嘉庆年间宫廷内有一种岑集抄本，对诗中的“胡”、“虏”、“戎”等字都空缺，连送颜真卿赴河陇的《胡笳歌》三个字都空缺，《走马川行》中的“匈奴”、《轮台歌》中的“单于”也都空缺。由此可见，清人的不注岑诗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清人诗话中虽也涉及岑

参，但都避开边塞诗，倒是对“早朝大明宫”唱和诸诗的优劣比较颇感兴趣，即此可见一斑。

民国以后，出现了几种文学史，也都不重视岑参。直至“五四”以后十多年，文学史家对岑参才渐渐注意。如一九三〇年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第十七章是《边塞诗人岑参》，一九三一年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卷二篇三第四节是《岑参及其派》。此后，“边塞派”的名字在文学史中就多次出现了。如一九三五年张长弓的《中国文学史新编》第十五章是《边塞派和自然派》，一九四一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十四章第四节是《高岑诗派》，杨荫深还有一本《高适和岑参》的书（一九三六年），是专讲这两个人的。不过这些书都是从历史的角度上作一般的介绍和论述，而不是具体的深入的研究。解放前专门研究岑参的著作，首推一九三〇年赖义辉的《岑参年谱》，他对岑参的生、卒年、赴西域年代等尝试作一解决，但有些结论证据不足。一九三三年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一出，这才对岑参生平中几个关键问题令人信服地解决了，这是十分精审的著作，为后来研究岑参者铺平了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岑参的研究才活跃起来。各文学史中对“边塞诗派”都有专章论述，研究文字不断出现，前几年对边塞诗的评价问题还曾展开一场争论。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边塞诗不免涉及到中国境内各民族间的战争等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争论是有益的。不过就岑参来说，两

次从军西域，涉及到的民族间战争，不外是唐朝的封建中央政权同吐蕃奴隶主地方政权、或者是同时降时叛的突厥残余部落(如阿布思)之间的斗争。吐蕃与突厥都非西域(尤其天山南)土著，不是闹独立而是对受中央政权管辖下西域地区的入侵。至于同大食的战争，则更是对外来入侵者的斗争了。所以岑参边塞诗中无论是对战争冷淡也好，或是对战争热情也好，都没有大的毛病可以指摘。至于诗中的胡、戎、匈奴、单于等字眼，都是历史的产物。

边塞诗多写战争和行役，这也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国先秦诗歌中已经有战争和行役之作了，《诗经》中的《东山》、《采薇》，《楚辞》中的《国殇》，就是代表。汉代乐府中的《战城南》、古诗《十五从军征》及曹操《苦寒行》，是先秦传统的继续。南北朝时期有不少战争题材的诗，其中除少数作者有战争经历外，大多数只是附会汉乐府题意而成。所以真正的边塞诗，只有到唐代才正式形成，其成为诗派，则是盛唐时期的事了。初唐时期曾从军戍边的大诗人有两个：一是骆宾王，唐高宗时曾经到过西域；再一个是陈子昂，武后朝曾经到过河西居延海和北边幽州。这两人可说是唐代边塞诗派的开路人。而大批边塞诗人的出现，则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盛唐时期诗歌中边塞题材相当流行，到过边塞的人要写边塞诗，如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王维、崔颢、李颀、高适、岑参，这就不用说了；连并未从军戍边的诗人也写边塞诗，如李白、杜甫就是这样。戍边万里之外，格斗黄沙之中，或因功而封侯，或血战而无

赏，战歿者的枯骨同边草并白，春闺的思妇望去雁而泪垂，这些题材无疑可使诗人们的神思自由驰骋。盛唐时期的赫赫战功，又为边塞诗的繁荣准备了合适的土壤。盛唐时期边塞诗人之多，以致形成了一个“边塞诗派”，当然还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在众多的边塞诗人中，岑参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是边塞诗的数量多，近八十首，占现存岑诗的五分之一，超出了其他诗人。二是岑参有长期的边塞生活经历，其他诗人除个别外，边塞生活经历都较短，或仅“一窥边塞”，所走路程谁也没有岑参的远，这是他边塞诗的深厚基础。三是岑参边塞诗有完全成熟的独特的风格，对前人有所继承，但又有自己的独创和发展。所有这些，使岑参在边塞诗派中占有一个突出的地位。

岑参虽以边塞诗著名，他的最高成就也是边塞诗，但他绝不止是写边塞，他的诗有相当广泛的题材。从隐于嵩阳起，十载干禄，初授官，四次在朝，两出外郡，留下了许多诗歌。岑参不是“田园派”，但他有很好的田园诗，这因为他“隐于嵩阳”十年之久，在终南山下也曾隐居过，他有长期的田园生活经历。岑参交游又很广，朋友来往、官场应酬之作也占有相当篇幅，不过这类诗的价值要低一些。

岑参的《走马川行》、《轮台歌》，在一千二百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觉气势磅礴、豪迈逼人。岑参的某些诗，表现出盛唐时期那种进取的、开拓的、博大的时代精神。杜

甫曾称岑参是沈约的“同行”，又曾比之为谢朓；杜确则认为“时议拟公于吴均、何逊，亦可谓精当矣”！这只是突出岑诗的某一方面，而且恐怕也不是主要方面。岑参边塞诗中某些篇章所表现出的东西，远非齐梁诗人所能做到的。盛唐最伟大的诗人当然是李白、杜甫，但岑参确也是除李、杜之外的灿烂的明星之一，应列名于第一流诗人之中，郭沫若在这一点上是很正确的。

迄今为止，除一部《岑参集校注》外，还没有关于岑参生平、思想、艺术的系统研究的专门著作。这部评传意图对岑参的生活经历、创作道路、思想发展等，作一综合的、历史的考察，想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供学术界、创作界参考。其生平事迹部分间有考证，评论创作则从诗人感受特点这一角度出发，为说明其思想、艺术特点，也与其他诗人作一些比较。

二、隐于嵩阳

1、岑参的家世

岑参是东汉征南大将军岑彭的后代。岑彭是南阳郡棘阳县(今河南南阳、新野两县之间)人，他的后代就一直被称作南阳棘阳人。其实后来变化很多，岑参父祖辈已经多年不居棘阳了。南北朝梁代末年，岑彭的后代岑善方跟随萧誉从江南到襄阳，又到荆州江陵县，“因官投迹，寓居于荆州焉”^①。岑善方的儿子岑之象先在北周作官，后又在隋朝作过几任北方的县令。岑之象的儿子岑文本起家江陵，入唐先作秘书郎，贞观末年，官至宰相，这就是岑参的曾祖。岑文本官高望重，是唐太宗的功臣之一，死后“陪葬昭陵”，他最为子孙所景仰，对子孙影响最大。岑文本是廉洁的“清官”，一生不治产业，“居处卑陋，室无茵褥帷帐之饰”^②，而且勤于政事，最后在征辽途中积劳而

① 唐张景毓《大唐朝散大夫行润州句容县令岑公德政碑》，见《读古文苑》卷十八。

② 见《旧唐书》卷七十《岑文本传》，下同。

死，为史家所称道。特别是岑文本还有很高的文才，自幼即“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隋炀帝大业五年，文本父岑之象为邯鄲令，被人讼不得申，十四岁的岑文本赴司隶台称冤，“辞情慨切，召对明辨，众颇异之。试令作《莲花赋》，下笔便成，属意甚佳，合台莫不叹赏。其父冤雪，由是知名”。岑文本到长安作秘书郎后，曾上《藉田赋》、《三元赋》，才名更著。擢拜中书舍人后，所草诏诰，“或众务繁凑，即命书僮六七人随口并写，须臾悉成，亦殆尽其妙”。又与令狐德棻合撰《周史》，“史论多出文本”。这些也都值得子孙引为骄傲。岑文本到长安后，把母亲、弟弟也都搬到长安，他的子孙也就没再回到江陵过。《法苑珠林》、《大清一统志》说岑参是江陵人，就是根据岑文本起家江陵这一点。其实，到岑参这一代，同江陵根本没什么关系了。

岑参尝自称是“相门子”，岑氏唐初三相，除岑文本外，还有岑长倩、岑羲，不过这两人有善始而无善终。岑长倩是岑文本的侄儿，他父亲名文叔，是文本的哥哥。文叔早卒，所以长倩“少为文本所鞠，同于己子”。唐高宗永淳年间，岑长倩又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作宰相。武则天称制后，长倩复拜文昌右相，封邓国公。这个人也曾阿谀武则天，上疏请改皇嗣姓为武氏，虽改姓为武，当然还是唐高宗李治的儿子。到天授二年，又有一帮拍马屁的人，列名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这是武则天娘家侄儿，就非李姓了。这时岑长倩却以皇嗣已立，不

可更立他人，与另一位宰相格辅元都不署名，并请切责上书的人，遂得罪了专权跋扈的武氏诸人。酷吏来俊臣诬陷岑长倩、格辅元、欧阳通等数十族谋反，斩于市，长倩五子同赐死，并发掘父祖坟墓。岑参《感旧赋》曾提及这次冤狱还株连到岑氏满门，“既破我室，又坏我门。上帝懵懵，莫知我冤；众人恹恹，不为我言，泣贾谊于长沙，痛屈平于湘沅”。岑参的父亲原为蒲州司户参军，这次也被派到夔州云安县（今四川云阳）作县丞，遭到贬谪。岑氏还有一位宰相，这就是岑参的伯父岑羲。岑羲进士及第后，累迁太常博士，长倩被杀，株连贬郴州司法参军，迁金坛令。宰相韦嗣立荐岑羲有才能，就是家庭有人被杀，出身不好。武则天说，只要有才能，不必管他家里如何。于是因受家庭牵连而未被重用的人，都受到提拔，岑羲也入为天官（吏部）员外郎，擢中书舍人。唐中宗神龙初武三思用事，侍中敬晖想上表请削去诸武的王爵，请人写表，大家害怕武三思，没人敢动笔。岑羲时为中书舍人，勇当其任，为辞切直，又得罪了武三思，左迁秘书少监。但以后又转为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又贬为陕州刺史，唐睿宗景云初，又同三品，封南阳郡公。唐玄宗即位不久，岑羲参与太平公主谋废立，事发被诛，满门查抄。关于这次变故，《感旧赋》中也曾十分感慨地说：“偪侧崩波，苍黄反复，去乡离土，隳宗破祖。云雨流离，江山放逐。愁见苍梧之云，泣尽湘潭之竹。或投于黑齿之野，或窜于文身之俗。”这次株连亲族也很多，时间也更接近岑参，所以影响

也更大些。张景毓《岑公德政碑》作于景云二年，当时尚未发生太平公主事件，所以岑植还曾“擢授一官”。但到先天二年，岑羲遭诛，岑植自然也受到株连，否则《感旧赋》不会说得那么沉痛。岑植其时不知是去了“黑齿之野”，还是去了“文身之俗”，因缺乏史料，难以确知，但此事肯定对家庭是有影响的。因为先人三代为相，这种往日的光荣，就使子孙时刻铭记在心。《感旧赋》也曾追述过岑羲为相时岑氏的富贵显赫：“朱门不改，画戟重新。暮出黄阁，朝趋紫宸。绣毂照路，玉珂惊尘。列亲戚以高会，沸歌钟于上春。无大无小，皆为缙绅。颀颀昂昂，踰数十人。”这种深刻的怀旧情绪，特别由于岑参的“早岁孤贫”而更为强烈：“参年三十，未及一命。昔一何荣矣，今一何悴矣。”前代的光荣，自身的没落，这引起岑参深深的感慨。这种感慨情绪，在岑参一生中似乎是贯彻始终的。这在他同时代的其他诗人身上，当然都是不可能有的。而且岑氏先是位极人臣，继则诛戮查抄，这种世事的苍黄反复，在岑参思想上也必然投下了很深的暗影。岑参后来又作官，又想去官，除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影响及具体遭遇变化外，其祖辈遭遇的影响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岑文本两个儿子，长子曼倩官终雍州长史（《元和姓纂》谓刺史），次子景倩做过麟台少监、卫州刺史、昭文馆学士，这便是岑参的祖父。景倩四个儿子，长子岑植，就是岑参的父亲。岑植是比较有点名气的，唐睿宗景龙二年，他由

句容县令擢升他官^①而离任，他的下属为他立了一通“德政碑”，碑文尚流传至今，使我们对他前半生的经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岑植字德茂，二十岁调补修文生，明经擢第，解褐同州（今陕西大荔）参军事，特授蒲州（今山西永济）司户参军事。岑长倩遭诛，左迁云安县丞。秩满，以父丧去职。服丧期满，调补衡州司仓参军事，随后擢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令。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岑植最后做过仙州（今河南叶县南）刺史，晋州（今山西临汾）刺史，大约就死在晋州任所。岑植为官清廉，家无产业，看来是恪遵岑文本的遗教，不过他一死，岑参就只好过“早岁孤贫”的生活了。

岑参上有二兄：岑谓，官终澄城丞，其他失考；岑况，官终湖州别驾，他的事情知道的多一点。《感旧赋》有“荷仁兄之教导”的话，其所指大概就是二哥岑况。岑况天宝年间曾作单父（今山东单县）令，颇有政声，和著名诗人刘长卿是朋友。岑参诗中曾多次提到这位二哥。如《梁园歌送王说判官赴河南》：“单父古来称虚生，只今为政有吾兄。……辋轩若过梁园道，应傍琴台闻政声。”《送楚丘鞠少府赴官》：“单父闻相近，家书早为传。”岑况后来在江南湖州（今浙江吴兴）作官，岑参《送人归江宁》诗“吾兄应借问，为报鬓毛霜”；《送扬州王司马》诗“为报吾兄道，如今已白头”：这两诗中的“吾兄”，也应为岑况。岑植死后，能代替

① 张景毓《岑公德政碑》只提到源乾曜曾“荐举”岑植一官，因而离开句容，但失载为何官。

父亲对弟弟进行教导的，应该就是这位岑况。哥哥能作弟弟的师长，估计年龄相差在十岁以上。岑参还有两个弟弟：岑乘，太子赞善大夫；岑垂(亚)，长葛丞。岑植死时，岑参大约十岁左右，因此两位弟弟年龄相差都不大，在三四岁之间。岑参到长安后，有一个弟弟跟他在一起。王昌龄开元二十八年有《留别岑参兄弟》一诗，岑参这年二十六岁，弟弟大概过二十，可能是岑乘。岑乘长安诗《还高冠潭口留别舍弟》、《宿太白东溪李老舍寄弟侄》，大概都是岑乘。岑垂(亚)的年龄更小一些，开元中还没有成年，不是留在母亲身边，就是跟随岑况读书。岑参弟兄五人中，年龄明显分为两组，恐怕不是一母所生。他们的父亲岑植二十岁为修文生，明经擢第在二十岁以后，到岑长倩被杀的天授二年(691)已经作了两任州佐，年龄当在三十岁左右，所以约生在唐高宗麟德二年(662)前后。岑参生于开元三年(715)，当时他父亲已五十四岁上下了。岑参最小的弟弟岑垂出生时，岑植应该在六十岁左右。唐初因户口锐减，提倡早婚，唐太宗曾下诏，命男二十、女十五即婚配，这是一种发展人口的政策。岑植出身官宦世家，或者不在此限，但最迟也当在三十岁成婚，头两个儿子约生在四十岁以前。岑植的夫人至多小于岑植十岁，到岑垂出生时，也在五十岁上下，已经过了生育年龄了，因此，岑参若非岑植的继室所生，就应为庶出。岑参父亲早死，他的生母带领三个小儿子又过了许多年，但岑诗中提到兄，提到弟，还有诗“寄闺中”，却一字没提这位母亲，这恐怕与